

儒法斗争对我国古代医药学发展的影响

马 万 禄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五室)

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

毛主席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在阶级社会中,医药学的发展总要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我国古代医药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它历来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重要阵地。在我国历史上,当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时,由于法家主张革新、进步、爱国的政治路线和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观,就使我国古代医药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反,当统治阶级转向尊儒反法时,由于儒家主张复辟、倒退、卖国的政治路线和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观”、“先验论”,这就使得我国古代医药学又长期地陷入发展迟缓的状态。历史的实践证明,我国古代医药学就是在不断地冲破孔孟之道束缚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就说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伟大的真理。在我国古代的医者中,凡是作出了贡献的,一般都具有法家的思想特征;而那些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尊经复古的儒医们,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成就,却成了医药学发展的障碍。

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来研究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医药学发展的关系,说明我国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正确评价法家在医药学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批判儒家的阻碍、破坏作用,总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促进我国医药学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国古代医药学长时期居世界的前列,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与疾病进行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智慧。

远在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在我国就产生了著名的医学经典著作《内经》。它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它用朴素唯物的思想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的防治,为祖国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卓越的成就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那时有医经 7 家(计有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旁篇)共 216 卷,医方 11 家共 274 卷。可是到了写《后汉书》的时候,除《内经》一部尚存外,其它的医书全没有了。可以肯定这些医书是被奉行儒家路线的东汉统治者和儒生们摧残掉了。因为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焚书”时“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内经》是我国仅存的一本最早的古典医

学理论巨著。最近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医书竹简二百枚,文体与《内经》相似,据推测可能与失传的《外经》有关。

在诊断学方面:具有特色的“脉诊”,是我国在诊断学上的一大创举。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我国的民间医生扁鹊就首先创用了“脉诊”方法。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以后经过不断发展,到西晋时(公元2—3世纪)王叔和写成《脉经》一书,这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脉学专著,它标志着较系统的脉诊理论和成熟的切脉方法已经形成,后来传到朝鲜、日本和阿拉伯等国,影响深远。

在药学方面: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是在西汉时写成的。后来经过历代的发展,到了唐朝,在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执政时,于公元659年由政府颁布了《新修本草》,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到了宋朝(公元1107年)时,我国又有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定药方书。我国明朝杰出的科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是集我国明代以前“本草学”的大成,共收载药物达1892种。在17—18世纪先后由外国学者译成了日、法、德、英、俄、朝鲜及拉丁文等,对世界药物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本草纲目》也为植物分类学奠定了基础,它比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的内容要丰富得多,而且在时间上也早一个半世纪。著名的科学家达尔文曾说:《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在治疗学方面:我国汉末著名的民间医生华佗,首创麻沸散作全身麻醉,为病人实行剖腹手术治疗。使我国在麻醉术和外科手术方面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早于西方1600多年,为我国医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针灸疗法源于我国,早在《内经·灵枢》中就有记载,到了西晋时,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总结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专书,后来对日、朝、法等国的针灸学有很大影响。

在传染病学方面:我国汉末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与疾病流行和谶纬神学作斗争的过程中,总结了我国汉代以前劳动人民与传染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理、法、方、药具备的医学巨著,建立了“辨证施治”的学术体系,对我国的医学发展贡献很大,后来继续研究“伤寒”的书竟达250多种。在预防天花病上,我国宋朝时就广泛地采用了人痘接种的方法,这要比英国人詹纳(1795年)发明接种牛痘要早七、八百年。我国明末清初的医学家吴有性,著《瘟疫论》,他在光学显微镜尚未发明之前就提出了传染病是由于人体感染了“戾气”所致。细菌是传染病的病源体,在西方到十九世纪才得到科学证实,这要比吴有性的“戾气”学说晚了两个世纪。……

上述历史事实,是对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全盘否定中医中药,妄图从根本上摧残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极其有力的批判。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我国历史上的儒家学派,尊崇“礼制”,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他们宣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孔老二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是“小人”。孟轲公然叫嚣:“善战者服上刑”,“辟草,任土地者次之”。

他们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贼工末技”、“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等。儒家经典《礼记》甚至提出：对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这真是反动透顶！我国古代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可是儒医们却胡说：医药学是“古圣人”所创造的。他们说什么：“伏羲创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发明医学”等等。这是“天才史观”在医药学领域中的表现，是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对历史的歪曲。他们对群众防病治病的实践经验，污蔑是什么“草泽之医”、“歪门邪道”，所有这一切都给我国医药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与儒家相反，法家比较关心生产，注重耕战。法家商鞅、韩非等人都重视奖励耕战，他们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道。汉高祖、吕后等人也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特别奖励垦荒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视劳动力的增长和兵员的补充，这在客观上就提出了发展医药卫生保健的社会需要。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生产的发展为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医药学的发展又为发展生产和军事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我国历史上那些中了状元的人，大都是没有真才实学，没有什么发明创造的。而在科学上作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敢于同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决裂，并且是重视和亲自参加实践的人。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明代，出身于较贫困世医家庭的李时珍，三次应考连举人没有考取，却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行医“千里就药于门”，细心为劳苦大众治病；另一方面又长期坚持上山采药。在行医和采药的过程中，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他访问过成千上万的人，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验方。他还阅读了八百多种有关文献，为了证实古书记载“蔓陀罗花”有“使人舞”“令人笑”的作用，他就亲自服药尝试。他集中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又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历时 27 年之久，终于公元 1578 年写成了《本草纲目》这一巨著（共 52 卷，16 部，190 多万字，插图 1110 幅）。但当时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一巨大的科学贡献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推广，直到李时珍死后三年即 1596 年才得到私人印行。后来李时珍的儿子把《本草纲目》献给了官方，明朝皇帝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几个字，就把它束之高阁了。由于《本草纲目》体现了尊法反儒的思想，出版后又受到某些儒医的激烈攻击。如清朝的儒医陈修园就公然叫嚣，要把《本草纲目》全部烧掉。这充分说明儒法斗争反映在医药学领域中也是相当激烈的。

三

“天命观”，是奴隶主阶级用来毒害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编造了：人间的一切都是“上帝”有目的安排的，一切自然现象是“上天”喜、怒、哀、乐的表现，不过是对人间赏善罚恶的手段。他们极力鼓吹“政权神授”。胡说：皇帝是“天”派来统治人民的，人们必须服从“天”和皇帝，如果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降祸。“政权神授”，完全是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它妄图要奴隶们服服贴贴地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孔老二所宣扬的“天命观”，他要人们“畏天命”。孟轲也跟着叫嚣什么：“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他们大肆鼓吹“灾降论”，胡说什么：人得病是获罪于天，是由鬼神作祟引起的。因此，有了病是不能用药物和针灸等办法来治好的，只能请巫医用祈祷、祭祀、占卜、禁咒等方法，祈求上天赐福和鬼神饶恕，才能“逐疫、驱疾”。

与儒家相反，法家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的一切运动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切自然现象与人们的善恶无关。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况曾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指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充分反映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

想,是对孔老二“畏天命”的有力批判。荀况还认为:生病不是“天”注定的,他说:“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意思是说:衣食充足而又按照时令进行活动,“天”不能使人生病;而营养不足,又不肯多活动,“天”也不能使人健康。王充也曾说:“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风湿与饮食者”,“血脉不调,人生疾病。”这些与孔孟的“天命观”完全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对鬼神作怪“灾降论”的否定。

反对“天命论”和巫术的斗争,在我国古代医药学领域中,是屡见不鲜的。《内经》上就有过这样的记载:“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就使医药学与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和巫术划清了界限。早在公元前541年,医和就首先反对了获罪于天和鬼神作祟的唯心主义的病因说,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外感致病的唯物的病因观。公元前五世纪,我国著名的民间医生扁鹊,针对当时巫医盛行用迷信方法治病现象,明确提出“病有六不治”,其中第六不治就是:“信巫不信医的不治。”这是对儒家提倡巫术骗人把戏的公开挑战。因此,尽管他的医术很高明,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信任,却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所不容。他先得罪了卫国的国君,继而又被齐国贵族逼走,最后到了秦国,当时的太医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李醯又派人把他杀掉了。汉末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他认为疾病是由于内脏和肌肤出了毛病或由于生活不慎造成的,根本否认鬼神作怪等谬论。他还曾讽刺过那些轻视医药、迷信鬼神的儒生们:在生病时,只能“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却落得个“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的可悲下场。他无情地揭露了巫术的欺骗性,猛烈地抨击了儒家的“有神论”和“天命观”。

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是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儒家主张复古倒退,反对革新,鼓吹“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在商鞅变法时,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儒生甘龙、杜挚之流效法孔老二,抛出了“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反动叫器。商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厚今薄古的政治主张,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到了战国末期,孟轲又大肆叫嚷“今不如昔”,公然提出了“法先王”的反动口号。法家荀况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这一革新进步的政治主张,彻底揭露了孟轲一伙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的政客和混饭吃的骗子。接着,法家韩非又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革新思想。他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可笑。后来法家王充、王夫之等人,还对董仲舒之流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进行过有力地批判。

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在古代医药学领域中也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在“尊经复古”,“今不如古”等儒家反动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儒医们极力宣扬什么:医药学是“上古圣人之教”,鼓吹:“言必本乎医经,治必本乎古法。”胡说:《内经》是黄帝所著,书上的说法不能改动一字。又胡说什么:针灸是古圣人创造的,针具是伏羲黄帝发明的,因此针的长短、粗细,刺入的深浅都不能变动分毫。又如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对祖国医药学作出了贡献。但后来一些儒医们竟把张仲景奉为“医圣”,把“伤寒杂病论”奉为“经典”“正统”,对他著作中的某些残缺错误之处也不敢非论,只能牵强附会,唯恐有失“勤求古训”和“尊古法则”。这种“非仲景之书不读,非仲景之方不用”,“古今医家莫过仲景”的迷信古人,抱守残缺,故步自封的孔孟流毒,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更有甚者,某些儒医竟把医药学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斥之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清代儒医陈修园就

是一个孔孟之徒，他曾叫嚷：“神农本草，药止三百六十品，字字精确，遵法用之，其效如神。自陶弘景以后，药味日多，而圣经日晦矣。”他还写了一本《医学三字经》，把医药学上的创造发明都诬蔑为“红紫色，郑卫音”（孔老二认为红紫色是邪色，郑卫音是淫声）。鲁迅针对这种“今不如古”、“故步自封”的孔孟之道，曾尖锐地讽刺说：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守着儒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斯大林同志说：“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他又说：“在科学发展史中有不少勇敢人物，不管有何等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也正是这样。我国宋代法家王安石在变法时曾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具有大无畏革新精神的战斗口号。积极支持和参加王安石变法的自然科学家沈括，在谈到医药学问题时，就曾着重批判过拘于古方旧说的保守思想。在王安石、沈括等人的影响下，当时一些医者纷纷起来反对尊经复古的风气，提出了：“世态居民有所变，此一时，彼一时”，“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革新主张。有的不遵仲景法，自制新方，出现了很多学派相互争鸣的新气象。后来到了金代，我国民间医生刘完素和张元素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可能治愈。”他们主张治病必须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反对泥守古方，而敢于自立新方。如对热性病，他们就多用寒凉药，突破了《伤寒论》用辛温药的框框，提高了治疗效果。明末清初的吴有性曾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这是对那种非古方不用，不敢改变古方的儒医们的有力挑战，又是对儒家守旧思想的深刻批判，因而也就推动了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

我国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冲破孔孟之道的束缚下发展起来的。据《内经·灵枢》记载：“八尺之士，皮肉在此，非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又据《汉书》记载：王莽时处死一个犯人，“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其五脏，以竹筵道其脉，知所终始，方可以治病”。这是我国人体解剖学的先声。可是，从此以后一千多年来没有人再敢于公开作人体解剖了。这是因为儒家扼杀了人体解剖学的发展，他们搬出来他们的“孝道”来吓人，儒家的《孝经》鼓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他们还要人们尊重尸体，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连一根毫毛也不许动。他们认为要用刀子切割人体进行手术是极大的不孝；甚至用针刺破皮肤，也算犯了禁律；若进行尸体解剖，则被视为极大的犯罪。如南朝有一个叫唐赐的人，他一次吐虫20多条之后而死，死前曾嘱其妻让她剖尸查明病因，其妻按照遗嘱做了，儿子也未予阻止。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知道后，竟加罪她为“不道”，儿子为“不孝”，结果母子惨遭杀害。可见孔孟的“孝道”，是地地道道的杀人之道。不仅如此，西汉的董仲舒还主观臆造了“人副天数”的伪理论要人们信奉。他胡说什么：老天爷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了人类。因此，天有什么，人也就有什么；天有五行，人就有五脏；天有四时，人就有四肢；一年有十二个月，人就有十二个大骨节；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人就有三百六十六块小骨头……。这就是董仲舒的“人体解剖学”，简直是奇谈怪论！可是，一切反动派都不能阻止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我国汉末的华佗，就首先冲破了儒家的“孝道”，为病人开肠破肚进行手术治疗，也为我国的人体解剖学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华佗的书没有保存下来。一直到宋朝，我国的解剖学家杨介，又一次大胆冲破儒家“礼教”的束缚，开始进行尸体解剖，实地观察了人体的五脏，首先绘出了《存真图》，成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准确的人体脏器解剖学图谱。我国清朝具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王清任，为了搞清人体的一些结构，他本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的反潮流精神，曾多次赴义塚观察被犬撕咬过的小儿尸

（下转第2页）

想工作,对科研人员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如把科研成果视为高档商品,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影响团结等,不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结果使科研工作走了弯路,受到损失。例如,去年有一项课题,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所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领导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片面抓成果,以致有的人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搞“论功行赏”,出现了争功、争名、争利的现象。后来,在重复试验时,由于科研人员名利思想作怪,心不齐,遭到挫折。之后,又产生急躁、埋怨、动摇等情绪,使工作走了一段弯路。大家说,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在讨论中,党委书记武彦荣说,在怎样对待成果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还存在着“没有成果就感到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有了成果,就感到趾高气扬”的思想,这实质上是“业务挂帅”、“成果挂帅”的思想反映,是非常错误的。许多同志都谈了自己在对待成果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们说,我们反对“成果挂帅”,并不是不要成果,问题是抓路线出成果,还是为出成果而抓成果?以什么途径取得成果?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我们只有以路线为纲,用政治统帅科研工作,才能搞出成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才能带领知识分子前进,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如果我们不执行正确的路线,出了成果,还可能被资产阶级夺去。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三、树立工农兵是科学技术的主人的思想,才能把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手里

通过学习、讨论,这个科研所的党委认识到,实现无产阶级对科研工作的领导,还有一个依靠谁的问题。大家回顾了一九七二年调整任务时的教训,那时,虽然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但是由于有的领导头脑里“专家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片面夸大学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把少数人从外国资料上搬来的框框,作为确定课题的依据,致使工作受到损失。党委委员李枝厚说,我担任一室支部书记时,由于没有真正树立工农兵群众是科学技术的主人的思想,所以有时想走群众路线,却走了专家路线,如选一项课题时,虽然发动科研人员进行讨论,但实际上还是听少数人的片面意见,把课题定下来。这项课题完全是从洋本本中抄来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后来只好下了马。这说明,在科研工作中,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才能更好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科学技术,否则就要失败。大家还说,历史是群众创造的,科学技术的主人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学者、权威。我们一定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头脑,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带领科研人员,深入实际,虚心拜工农兵为师,认真接受再教育,全心全意依靠工农兵群众,发展生物化学研究工作,坚定不移地走我国科学技术自己发展的道路。

【原载《文汇报》】

(上接第7页)

体,为了弄清横膈膜的结构又三去刑场细心观察。历时42年之久共观察尸体一百多具,同时还进行了动物解剖,终于写成《医林改错》一书。他纠正了过去医书上对人体内部结构的一些错误认识,正确发挥了李时珍等人关于脑的作用的论述,批判了儒家把道德理性归之于“心”的谬误。使得我国人体解剖学更趋于完善和精确。王清任大无畏的革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却引起了孔孟之徒对他的大肆攻击。当时的儒医陆九芝就咒骂王清任是“教人于髑髅堆中,杀人场上学医矣”。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数学上的定理一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些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由此可见,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医药学领域中,革新与守旧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医药学的发展。